

方石玉 / 著

大国

软实力

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理论 with 实证研究

GREAT NATION
SOFT POWER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经济科学出版社

方石玉 / 著

GREAT NATION SOFT POWER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大国 软实力



经济科学出版社

(英) 方石玉 / 著 方石玉 / 译

ISBN 7-5017-0000-0

责任编辑：周秀霞

责任校对：徐领柱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软实力：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方石玉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 - 7 - 5058 - 7651 - 4

I. 大… II. 方… III. 服务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1403 号

大国软实力

——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方石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32 开 9. 75 印张 240000 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 - 7 - 5058 - 7651 - 4/F · 6902 定价：20.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尔街挥手之后

(代序)

黄卫平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大国软实力》，是方石玉博士多年来潜心研究、认真调研的成果。

软实力在中国的研究、传播是近年的事情。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通常将这种实力分为有形与无形的力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将综合国力明确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并将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即一个国家在硬实力之外的吸引能力和政治导向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升，软实力的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从最初仅仅是书斋中、讲坛上少数专业学者讨论

的理论模型和概念，到今天，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兴国理念。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主要谈的是国际关系范畴的内容，往往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形成的对外影响力，对它进行研究的大多是国际关系、媒体、文化领域中的学者，理论与政策、实务的探讨大多也在上述领域中，一般包括：一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认可程度，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等等。但是，从经济学视角对大国软实力进行探讨的并不多。事实上，正是华尔街一挥手，形成了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正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也一定程度上重新界定了世界产业的格局，在世界经济中，往往因为美国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几句话，国际金融局势就会发生逆转，一部《货币战争》使很多人思考无形力量的含义，这些真正软实力的体现，如果较少从经济学意义上去探讨，多少让人感觉还缺少点什么。方石玉博士的工作和他进行的研究，具有探索性的意义，希望这一研究可以影响人们对软实力的看法，从而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思考。

我们清楚地知道，一部出色的论著往往可以影响读者的思想乃至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形成。《大国软实力》从经济学的角度，以生产者服务这一无形的实力为分析基点，力求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

对于软实力的探讨和理解的逐渐加深，使之更加适合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并争取作为研究人员、改革规划制定人员较好的参考用书。

第一，我们认为，任何从经济理论探讨问题，其科学性首先就表现在是否具备完整的内在逻辑体系，尤其是软实力这样一个与现实结合得很密切但又并不十分严谨的说法，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作为其内在支撑，便很容易流于各种论点的集合与大而化之的材料的堆砌，甚至是春秋笔法的描述。探讨软实力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揭示其内在的经济理论逻辑，无论是对于进一步深入地把握西方的软实力理论，还是构建经济学基础的软实力理论体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把握服务这一软实力核心的主要内容，构建生产者服务经济学的科学体系，首先就要解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正是这一鲜明的逻辑线索，将丰富的理论内容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既体现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严密性、完整性，也有利于人们对于软实力理论体系的了解、把握和运用。因此，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去探索和揭示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这一逻辑线索，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通篇论述的内在联系。

第二，我们认为，任何经济理论，其科学性还应该表现在其理论是建立在对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科学、准确界定的基础之上的。以服务的经济学分析为例，尽管这一新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诞生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直至今日，在国际范围内，对于服务这一软实力的重要组成的理论概念还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界定。在本书中，

作者从经济全球化的深远背景出发,以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作为划分标准,提出了有关生产者服务的明确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软实力的界定,给一个国家在世界尤其是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新的思考。

第三,我们认为,作为一本中国化的从经济软实力角度深入分析生产者服务的专著,应该更多、更广泛地反映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本书体现了中国学者为创立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角度的生产者服务分析体系所做的尝试。考虑到深入分析的需要,根据经济学的学科特征,作者分析了激进学派、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制度学派理论的观点。除了努力揭示生产者服务的规律外,也注重了生产者服务体现的软实力的表面现象和过程联系的描述,尽管没有在更深层次上刻意分析它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结构及其所引发的全面矛盾,却有助于读者对于所论述的内容看得见、摸得着、读得懂。在方法论上,本书在定量、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了一些数学方法及推导,突出著作的理论性,并以理、以论、以例贯穿全书,以学术的语言进行论述,将复杂的经济现象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使得它能够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使读者能够了解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新事物发展的规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小康、富裕,发展经济是唯一的途径,结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况,借鉴其他国家已有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尤其从产业递进,形成产业的研发、加工、物流、金融的网络体系,

形成地域产业相互支撑的集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沿海、沿长江、沿陆路交通干线形成中国全面的经济网络体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2008年中期，中国政府关于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地域规划已经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就此而言，从经济学意义上对中国现实的非政治、文化、国际关系软实力进行分析、论述，应该说是其他学科理论分析所不能替代的。我们希望作者在研究中进一步加深对经济学意义软实力的理解，推动软实力在中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在实践中影响。

总之，这部著作内含作者的最新思考，经济理论分析深入，且涉及世界和中国未来着力发展的崭新意义上的软实力，值得认真一读。

于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10月10日

自序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破阵子》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昔日战场上的厮杀，依然存在于当今世界的许多角落。但是，人们在不断感叹文明社会仍不可避免发生流血冲突的同时，更加关注的可能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各类经济活动。那些发生在国家、地区贸易间的合作、竞争、冲突、摩擦，则如同一把把利剑，时刻悬在各国决策者的头顶，也让各类投机家、经济学者寝食难安。

遗憾的是，经济活动从来就没有确定的、统一的指导性理论，因为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其不确定性。没有一种经济理论是完全正确和长盛不衰的。然而，宇宙在基点的诞生，鸡蛋孵化成鸡，以及万物的出生、成长、死亡，似乎都有某种无形的手在起作用。这只无形的手应该就是所谓的规律。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开始，李嘉图、凯恩斯、科斯、弗里德曼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见解，试图揭示一定经济现象的内在经济规律。这些在严格约束条件下的理论和见解，确实对某些甚至重要的经济现

象做出了相当合理的解释，并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但是，这些近乎实验室模型的理论由于附加了诸多前提约束条件，尽管其部分或大部分结论符合特定的事实，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究竟有多大，以及能不能适用于未来，仍然无法判定。然而，正如人们无法想象大爆炸之前在基点处的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样，人们仍然无法摸清楚经济发展的规律。但经济学的魅力却正在于此，可能越难以捉摸的东西，越具有神秘感，越是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对同一个经济现象的解释，从来没有两个经济学家的意见是相同的，人们却还是乐此不疲地寻求能诠释经济学的真理。

各国政府也陷于经济学家的争论当中。古典、新古典、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等诸多学派，纷纷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影响或迫使当权者接受它们的理论，并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但是，当它们在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时，无不显得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作为经济学理论重要部分的国际贸易理论亦是如此。其实，如果从全球区域的眼光，消除国家之间的因素，国际贸易实际上等同于国内贸易，国际市场实质上是国内市场的向外延伸，只不过国际贸易的主体除了企业之外，还有国家的参与。然而，正是由于政府的参与，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政策才成为政府经常摇摆不定的选择。无论采取何种贸易政策，政府的目无非是帮助本国企业将产品和服务市场延伸到别国，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利益。当本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占领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渐显得重要了。

从国际贸易角度，国家可以分为贸易大国和贸易小国。在特定的商品贸易或者服务贸易的贸易项目下，一般而言，贸易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则显得比较强势。这种强势主要体现在大国在商品或服务的供求关系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如对定价权和供求量的影响力等。相应地，贸易小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就显得没有贸易大国那

么重要了。在经济学中，经济大国与贸易大国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经济大国在很多时候就是贸易大国，但是贸易大国并不一定是经济大国。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比如，作为毫无争议的经济大国的美国，在很多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中，同时也是贸易大国；而中东的许多阿拉伯国家在石油贸易中，属于石油贸易大国，但它们当中却没有几个经济大国。

问题在于，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选择何种经济和产业政策，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任何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也无法给出唯一正确的解答，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向正确的方向靠近。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改进和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从而把劳动力从农业社会解放出来，进入工业社会。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通过机器生产，把来自农矿业的原料制造成工业半成品或成品，以及对工业半成品进一步加工制造成成品的过程。无疑，制造业是工业社会的灵魂。到目前为止，英、美、德、日等国一直走在工业化前列，其制造业也代表了世界最高发展水平。按照时间顺序，从17世纪起，世界制造业中心首先在西欧各国渐次推移，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为较早的工业化国家。接着，受原先宗主国的影响，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另一个重要的中心国家，至今仍然是世界制造业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一跃成为这一地区制造业的领头羊。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天空中另外一些耀眼的星辰，直至今日，它们仍然熠熠生辉。这些国家之所以在制造业领域取得其他国家无法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创造历史，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功不可没。它们及时抓住机遇，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本

国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外贸政策。这样，该国某些制造业发展起来，逐渐在技术、成本上占据领先世界的优势，一批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从而推动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国家实力的日渐增强。

工业化中期以前，国家之间较量的是占有多少先进的“粗、大、长、重”的工业产品，如钢、煤、汽车、船舶等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我们抽象地称之为“硬实力”。世界近现代史上无数次战争争夺的是这些物资，较量的也是这些物资。国家占有这些物资的多寡，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强弱。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时代向前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服务于制造业的产业开始崛起。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产业资本的支持，这样金融资本逐渐向产业渗透，进而控制整个产业的关键链条。另外，包括运输、工业房地产、仓储业、信息服务、科学技术等服务产业，也围绕着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发达国家开始利用产业链垂直专业化分工原理，把生产过程解构成若干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环节，在掌握关键环节的前提下，把其中的加工和组装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生产。这就可能导致原先以“粗、大、长、重”为标志的发达国家工业转变成以“细、小、短、轻”工业产品为标志，实际上就是国家产业“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变。可以说，国家的“软实力”决定了国家竞争力的大小。

在本书的论述中，产业“软实力”并不是一个难以衡量的模糊概念。从定量的角度，简单地说，软实力的大小在于在提供生产或者服务后获得附加值的大小。在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附加值并不相同。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先发优势，攫取了其中附加值较高的部分，而把其中附加值较低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自私人性的角度上说，落后国家不应该陷于对其进行过多的指责和批评当中。它们所能做的，就是扬长避短，参与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

家,接受了在产业链分工中地位低下的事实,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经济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这种只顾经济效益、牺牲环境和资源的发展遭到不少人诟病,但是这实际上是当政者一种无法避免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较为鲜明。

如果一定要概括中国 30 年制造业发展成果的话,笔者以为离不开中国劳动力禀赋丰裕的因素。确实,在突破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改革之后,中国正是享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一批批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进来,中国逐渐变成了世界的“大工厂”。我们并不否认发达国家从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在某种产业上甚至是大部分利益。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些带来附加值也同时带来污染的制造业,它们有可能就转移到别国去了。关键在于中国如何从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即获取更多的附加值,同时尽量减少污染。特别重要的是,从单个产业来看,中国获得产品附加值确实惊人地少,但是中国巨大人口禀赋优势能够吸引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产业。这些附加值加总的结果也是巨大的。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件在美国售价 9.99 美元的芭比娃娃,属于中国的附加值只有 1 美元,大约 10%,但是中国几乎生产了世界芭比娃娃的 90%,如果全世界有 1 亿件芭比娃娃的话,中国就获得了 9000 万美元的附加值。从量上来看,这是相当可观的。另外,由于众多产品的零部件都在中国生产,实际上中国还存在着巨大的组装市场,这又是另一块附加值。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一旦这些生产环节进入中国之后,为之服务的高附加值的其他产业会慢慢转移到中国,中国又可以从中获取一部分附加值以及服务技术外溢所带来的好处。这正是本书所力图证明的。

因此,如果从产业转移的角度对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进程进行划分的话,则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制造业转移阶段;二生产者服务业转移阶段。应该说,中国在第一阶段

获得了成功，目前正在向第二阶段转移。很难评价到底哪个阶段难度更大，因为在第一阶段之初，中国毫无经验。也很难说由于有第一阶段成功的积累，第二阶段就变得容易，因为中国在这个阶段更没有什么经验可言。从世界范围来看，生产者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日及欧洲国家，明显占据产业链的最高级地位。这些国家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将部分生产者服务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之后，本国的生产者服务业力量并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强。比如，美国花旗银行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服务于当地的美资及其他企业和个人，有益于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的提高，但是这并没有给美国银行业带来不良影响。这一点与之前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很大的不同。受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因素的吸引，很多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之后，宗主国的该项制造业在产量规模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些甚至完全转向发展中国家。比如，曾经在英、美等国高度发达的纺织业，到现在已经基本成为中国制造的天下。这里似乎蕴涵着一种现象：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之后，能像制造业一样获得发展吗？如果不能，又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也许本书并没有给出读者期望的解答。根据中国目前工业化的现状和具备的各项条件，我想30年后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应该能给出比较肯定的答案。因为中国制造业近30年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相当成功的。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说过，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看似调侃的一句话，其实蕴涵着很深的经济学理论，更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那么，本书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从大量的资料中，笔者发现，中国理论界在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领域鲜有系统的论述。本书正是从中国这项研究的空白出发，对有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除了书中难免有不少疏漏之处，需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之

外，笔者更想强调前面所说的不确定性原理，即从长期来说，本书的论述对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这类经济活动的指导性是不确定的。尽管如此，本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总算开了个头，最主要的目的是吸引后来研究者的参与。

在这样一个普遍高通胀的时代，避免经济大萧条和实现经济增长更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作为经济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无疑应该比其他领域的人肩负起更重的担子。

是以为序。

方石玉

2008年10月30日于深圳

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产者服务业所产生的 GDP 和其从业人口在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中,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逐渐成为主流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这股潮流逐渐由发达国家涌向以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东欧和东南亚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它的这种跨越国界、地区界限的转移,无疑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对移出的母国、移入的东道国和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是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基础是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国际分工理论中代表性的主要有:生产要素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规模比较优势理论、节约交易费用理论、生产网络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分工和技术对市场的反作用理论等。这些理论从历史和当时的现实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对国际分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对一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遵循国际产业转移中某些普遍性规律。从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发展来看,大部分研究集中于转移的动

因和方式上。小岛清、刘易斯、弗农、劳尔·普雷维什和邓宁等在解释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显然，在分析转移的方式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外包理论更注重结合实际。

然而，作为一项新兴的课题，理论界对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研究却并不系统。大部分研究只是集中在服务业国际转移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作用、方式、影响、区位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后人和本书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书的研究从考察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况开始。在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逐步开放的市场体系下，世界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偏移，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全球市场，把同一价值链上的不同阶段分离出来，制定了全球化的经营战略。在这样的宏观、中观、微观背景下，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成为可能。同时，产品产业链的可拆分性为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准备了物质条件，科技革命提供了技术条件，而各国经济规制的逐渐放松又提供了政策条件。这些条件使得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由可能变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历程看，在方式上，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经历了从外国直接投资到业务离岸化，再到项目外包等；在地区上，先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转移，再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在产业上，从金融、贸易，到供电、供水、电信、商务活动，再到研发的顺序。在转移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发达国家在其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即生产者服务业总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或者从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二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单个产业转移的地区流向很不均衡，即金融保险业等高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而物流、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三是生产者服务业大多向国际性的大都市转移并形成集聚，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等；四是